



一本打开的书

第 二 部

卡 维 林 著

一本打开的书

第二部

符拉森克娃医生

〔苏联〕卡维林 著

成 时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В. КАВЕРИН

ОТКРЫТАЯ КНИГА

据英译文“OPEN BOOK”(LAWRENCE & WISHART LTD., 1955 LONDON)译。据“ОТКРЫТАЯ КНИГА”(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ЛЕНИНГРАД, 1953)校。

一本打开的书(第二部)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251,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4}$ 插页 2

1984年2月北京新1版

1984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38,500

书号 10208·173

定价 1.20 元

目 次

第二部 符拉森科娃医生

第一章	在国营谷物农场	385
第二章	几年	473
第三章	未知的道路	507
第四章	探索	585
第五章	激流	609
第六章	寄入籬下	645
第七章	光与影	699

第一章 在国营谷物农场

1. 样样都新鲜

雨下过不久，道路却已经干了，草原上的太阳还像以前一样炙人。我向四下里眺望，样样都挺新鲜！我们的汽车驶过的那条道路给拖拉机的履带碾得凹凸不平。我们越过了一辆、两辆拖拉机，接着是一长列拖拉机、车厢和流动厨房组成的车队。到处只见一片草原，郁闷平坦的草原！只是东一处、西一处的闪过一尊树立在墳丘上的平淡无奇的石像（斯吉台人的翁仲）。一路上，好大的尘土，连我从手提包里掏出来的手绢上也尽是土，就像我有意收集了来放在那儿似的。雨又下起来了，沉重的稀疏的雨点像石子一样打在地上，打得尘土四处飞扬。

我的身边有许多旅伴：上国营农场去和自己的丈夫团聚的女人啦，工人啦，拖拉机手啦，机械师啦。一个笨手笨脚的胖大汉，大耳朵，鸭舌帽压到脑门子上，哼着斯威特洛夫的“格列纳达之歌”^①。他老哼那头一节，哼了一遍，隔不多久，又哼第二遍：

再见了，亲人们！

再见了，家庭！

格列纳达，格列纳达，

我的格列纳达！

他从萨尔斯克^②起就一直哼着“格列纳达之歌”，到现在已

① 苏联诗人米哈依尔·阿尔卡捷维奇·斯威特洛夫关于内战的诗篇。

② 苏联南部罗斯托夫省的一个城市。

經有三四个鐘頭了，因此，末了，我終於開始覺得：這單調的曲子不知不覺地成了我所見所聞的一部分。我們認識了。原來他是第五國營谷物農場的機械師，他姓鮑羅杜林。

鮑羅杜林旁邊坐着一個高個子男人，他穿一條方格子馬褲，一雙防水布靴子，敞着襯衣，露出健壯的胸膛。他一邊笑，一邊咒罵場長的禁酒令（我不知道在第五國營谷物農場，喝酒是禁止的）。

“蘇打水和啤酒！你對這些藥料有什麼說的，醫生？”

我們車上的每一個乘客都有他自己的事兒，可是，不知怎麼，它們和這個人的事兒比較起來，簡直算不得什麼：他那麼自信地高聲談他的事兒，那麼震耳欲聾地哈哈大笑，露出那麼得意的表情不時望着大路。然而他的得意是應該的，因為路是他修的：“一晝夜修一公里，連夜借着汽車前燈的光趕工。人民委員在他的指令中兩次表示謝意！”這是工程師列普寧，築路隊的隊長，過去是布瓊尼^①手下的一个騎兵，他正是這樣的一個人，他——

丟下了小屋，

去打仗，

為了要把格列納達的土地

交給農民。

“醫生，您知道不知道第一騎兵軍團是在薩爾斯克草原上誕生的？”

天黑下來了，司機擰亮了前燈，幾只鳥兒在淺藍色的燈光中來回掠過。我看那第三個旅伴：他是個中年人，帶一只手提箱，

① 蘇聯元帥，內戰時曾率領第一騎兵軍團，大敗鄧尼金和弗蘭格爾的白匪軍和波蘭軍隊。

穿一套稍旧然而很齐整的衣服。他姓瑪斯洛夫，他跟列普宁一样，也是个工程师，現在从莫斯科到国营谷物农場去。他的外表平常：不算大的臉，小鼻子，扁平的嘴唇。他抽着烟，一声不响。只有在大家热烈地爭論起在这一帶地方能不能种棉花来的时候，他才抬起了眼睛——一个从来不提高嗓門說話的人的冷冷的眼睛。

远处出現了灯火，从它們排列的整齐上，我猜那是給灯光照亮的窗子。啊，这下連屋子本身也看得見了，它們在这平坦荒涼的草原上显得很奇怪。屋子是三層樓的，并不多，有六七座。我們到了。原来这是第五国营谷物农場的中心村。守夜人拿了我的手提箱，領我到宿舍去。他嘟囔着回答我的詢問說：場長不在，茶沒有，能找到一个空床位就算是好的了。我們走进一所还没有盖好的屋子，守夜人用灯笼光給我指点了一个空床鋪。我洗了臉，躺下来。什么东西倒出来碾碎的鬧声以及突然在窗外閃亮的灯光弄得我睡不着覺，那准是夜班的人在干活。我非睡不行！

……两个月过去了。深秋天气。在一所还没住滿人的新房子里，一組空蕩蕩的房間的一个小房間(全中心村的人都管它叫“医务所”)中，我坐着写信，在信里，我毫不夸張地談我的事务：“亲爱的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我几乎每天都想起我們的談話，你記得嗎，就是你說在乡村里，可以而且应当作科学研究那一次……”

我一边写，一边看到我的老师 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扎奥席尔斯基就在我的面前，他就在我对面坐着，双手抱在胸前，胖胖的身材，花白胡子，狡獪而年青的眼睛。

“第一个問題：您应不应该把自己完全献給实用医学？我的

回答是不應該。为什么？因为凡是您有兴趣的一切，您都不由自主地着眼在它們的理論方面。”

“第二个問題：您在医学院畢業以后去不去乡村？毫無問題，要去。为什么？因为这对您的科学事業只会有好处。”

灯光时明时灭，或者說差不多灭了，只有在冷却的灯絲的纖細淡紅的花紋还看得見。得啦，我真的是在乡村嗎？几座三層樓的房子立在一望無际的草原上。今天早晨，我看見一个高个子、笨手笨脚的园丁在管理处前边的廣場上打樁子，每逢拖拉机开到他的未来的花园里来的时候，他就生气。一長排小屋橫貫整个中心村，这是公社大街，未来第五国营谷物农場中心街道。远处地里，流动厨房在冒烟，帳篷在秋風中閃动，綠色的棚車里，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在睡他們的短促的提心吊胆的覺。

不，我不是在乡村里！可也不是在城里。也許，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說得对，在这种新的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中隐藏着从事科学研究的新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可是怎么下手呢？从哪一方面进行呢？

空蕩蕩的、發散着新的石灰气味的屋子里靜悄悄的，桌子上放着那封沒有写完的信。

同一組房的人走到厨房去洗臉，接着又在樓梯頂上把大衣抖了又刷，这一切他作得有条不紊，不慌不忙。当我在到国营谷物农場来的路上初看到工程师瑪斯洛夫的时候，我沒想到他会和我同住一組房。

“医生，您在家嗎？請開門！”

我开了門。一个不相識的姑娘，光着脚，头巾擱在肩膀上，站在黑漆漆的大門口。她的一双腿齐膝盖沾滿了爛泥。

“有什么事？”

“妹妹快死了。”

“誰的妹妹？”

“我的。”

姑娘哭了。

“她在哪兒？”

“在餐厅里。她打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您能来嗎，医生？”

“能，能。”

“那我走了？……”

我拿了装着几乎我的全部药物的手提包，走到大街上，又站住了，因为要到餐厅去，必须跨过这条大街，而跨过它又不可能。街上满是泥浆，又黑又稠、光闪闪的泥浆，我也曾跟泥浆打过交道，特别是童年时在洛巴兴的时候。可是这稠稠的滑腻的粘住你的腿的泥浆又哪能跟洛巴兴那和善的稀泥相比呢？我跨了一步，腿就慢慢地陷下去，好运气，才陷到了脚踝子边！这一来，我总算踏上了一塊架在近旁的木板。这要是前一天司机们铺在抛锚在我的“医务所”旁边的汽车底下那块木板，可就糟了。我又跨了一步，果然是那块木板！腿没到了膝盖边。我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原状。这怎么办呢？

这时候，一个大声呼吸、快步走着的魁梧汉子从黑地里迎着我走来。那是工程师列普宁。他穿一件工作服和一双高过膝盖的胶皮靴子，戴一顶宽边帽子，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头拴住了他的靴子的耳扣。

“是您嗎，医生？”

“是的。”

“陷下去了？”

“是啊，真糟糕。”

“这是因为年青姑娘們晚上應該好好睡覺。”

“你的蠢話已經說够了。最好还是帮我一下忙。”

他打了一个哈哈，迈了一大步。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已经把我抱了起来，送我过了街，小心翼翼地放到地上。

“謝謝您，列普宁同志！”

“不用，說正經的，医生，您上哪兒？”

“您呢？回家去嗎？”

“不錯。”

“那就請您叫醒助理医师，告訴他，我等着他。”

我的助理医师叫列翁济·庫茲米奇，是列普宁的隣居。

“在哪兒等他？”

“在餐厅里。”

“在餐厅里？那兒出了什么事？”

“我还不清楚。”

这时候，我已經离得他远远的，在街对面的便道上。几分鐘以后，方才那个哭哭啼啼的姑娘在餐厅門口和我遇上了。

我沉思着（虽然我并没有時間来沉思），站在她的妹妹跟前，她不省人事地睜眼躺着，在那双眼里，生命的最后的閃光已經在熄灭了。

她是个混凝土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在沙堆上。她的胸脯上有一塊不大的瘀血，可是既沒有脫臼，也沒有骨折。那末为什么她的脉搏几乎覺不出来呢？为什么她的呼吸那么不均匀，那么断断续續呢？为什么（我提心吊胆地端詳着她的臉）她的鼻子尖了，嘴唇皮子發青呢？

我的眼前出現了外科学綱要里的一頁。這一頁書在我看来就像这个垂死的而且在五分鐘到十分鐘之后肯定無疑地会咽气

的姑娘一样清楚。“在进行外科急救时，医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做什么？’然后是‘怎样做？’”但是，如果医生乍看到病人的时候，病人的脉搏已经在停止，眼珠子已经开始发暗，开始翻到眼皮子底下去，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连一分钟的作最最仓促的诊断的时间也没有，那又怎么办呢？我除了一针针的注射樟脑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人工呼吸吗？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能不能用人工呼吸呢？

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这念头在这个半明半暗、摆满了堆着髒碗碟的桌子的厨房景象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古怪，不，这甚至不是念头，而是在脑子里一晃的回忆，我回忆起了自己唯一的一次亲眼看见名医让涅里则用针往一个躺在手术台上的病人心里一扎使他起死回生的情景！可是他首先有肾上腺素，其次，他对针要往哪儿扎，是往第五与第六根肋骨之间扎下去呢，还是往第四与第五根肋骨之间扎下去不见得有什么怀疑。

“把她的工作服脱了！快，快！”

我小心翼翼地举起她的随人摆佈的胳膊。又小心翼翼地举了一次。举了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举了一百次、两百次、三百次……

厨娘往爐子里添柴，把鍋子移开，一边竭力不闹出声音来。端菜的姑娘们踮着脚尖出出进进：时间耽誤不得，得讓下一班人吃饭。有人砰地一声闖进来，人家攔住了他：

“嘘——嘘！輕一点！”

餐厅里变得静悄悄的。大家小声說話，不挪动椅子，也不碰碗碟。他們全都知道隔壁离他們兩步路的地方进行着工作，一种均匀、費力、單調的工作……

——二。那半开半閉的眼皮子青得像死人一样。——

二，一点兒希望都沒有！我汗流如注，脫得只剩一件薄薄的短上衣。——二。多奇怪，她的眼白用各种花样往上翻！——二。我支持不下去了。再作二十次就完了……哦，現在再作二十次。

女人們把我团团圍住，这是說，接班的人走了？厨娘洗刷着爐子。喔，背痛得多厉害啊！管它呢，——二！

“死啦。”

“望她早升天国！”

“願她永远安息！”

女人們哭了。——二。沒有办法了。得了。再来二十下就完了……哦，現在再来二十下！她的眼皮子动了一下。嘿，这是我活見鬼！啊，真的动了一下！——二。这下我得認真的干了。

“这很好！灯再擰亮一点！拿水来！”

一个鐘点以后，我回家去。街上还是那么黑，甚至更黑了。泥漿还是在黑地里陰森森地閃光。天气又冷又有風。餐厅里的姑娘在匆匆忙忙把剩下的大麦粥端給夜班的人以后，送我回去。她們問我，学医生难不难，医学院里对男人和女人的要求是不是一样的；我大模大样不慌不忙地回答她們，可我一边听着自己的話，一边心里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猝变症！唉，我的知識还是多么少啊！”

黑地里出現了一个穿長大衣、偻背的人的呆滯的身影，这是助理医师列翁济·庫茲米奇，就是我托列普宁去叫的那个人。

“是您嗎，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出了什么事？”

这天早晨，送来了一个燒伤的孩子，我吩咐助理医师在伤处表面敷上丹宁酸药膏，这是个新鮮办法，他就把我的处方撤消了，为了这事情，我跟他大吵了一場；在每一封給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扎奧席尔斯基的信里，我总要訴上半年列翁济·庫茲米

奇怎样不讲究整洁、怎样懒惰、怎样蠢笨的苦。可为什么这时候，我觉得他是那么善良，那么好笑，那么可亲呢？

“事情都办好了，亲爱的列翁济·庫茲米奇。您来晚了。”

“来晚了？”

助理医师把手罩在耳朵上（他耳朵有点聾）走近了点，忽然，他全身猛动了一下，滑倒在泥漿里。姑娘們哈哈大笑，拉他起来。

“医务所”到了。

“晚安。”

“晚安，医生！謝謝您！”

“多謝您！”

“这又为什么？”

“为了盧莎！”

“医生，她能活嗎？”

“一定能活！”

“哦，再謝謝您！誠心誠意地謝謝您，医生！”

……午夜兩点鐘，天光照例不再黑下去了，可也还没有放明。我又是孤另另一个人。我在冷冷清清的厨房里大洗了一通，也不管用多少水，然后，臉蛋兒給凉水冻得热呼呼的，回到自己房里。桌上放着那封沒有写完的信。“亲爱的尼古拉·华西里耶維奇，我几乎每天都想起我們那次談話……。”好！明天写完它！現在我得睡了。

我一头倒在又涼又潮湿的床上，一下子就睡着了。可是在睡夢中，我老覺得有了什么喜事，大喜事！这喜事是什么，我却想不出来。

又是三个月过去了。春天到了。

……我已經和場長談完了話，談話非常簡短，可是不走，

于是小个子、紅頭髮的場長就为我不走生气。好，他爱生气就生气好了，我管不着！我耐心地等他和一个工程师、联合收割机修理專家作完了一次長長的談話，然后是一个女拖拉机手，她訴苦說她丈夫拋棄了她，然后是一个要到薩爾斯克去接收运貨汽車的机械师，然后是列普宁，他沉着臉告訴場長：煤油联合公司又沒有送潤滑油来，他已經給对方看了一点厉害，讓他們到法院去告他好了。然后，場長死命不朝我这边看，又接待了一个从管理合理化学院（世界上居然真有这么一个管理合理化学院）的人。然后党委書記契里莫夫来了，这下場長要裝出沒看見我在他房間里的样子，就更加困难了。在契里莫夫笑着說“他沒有不能讓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知道的秘密”的时候，場長不由得作了个气惱的手势。这下更好了。我津津有味地听着他們的关于“屯营制”的优缺点的冗長的談話。所謂“屯营制”，就是人們到了地里以后，整个野外工作时期就在那兒住下来，从一个垦区轉移到另一个垦区。契里莫夫提出另一个办法：成立几个拖拉机縱队，好，你們談吧，反正沒有个病房就不成！

我天濛濛亮起的身，这时候很想吃东西，很想站起来走；离傍晚越近，这么一个解決問題的办法对我就越有誘惑力。可是我这一走，病人就还得像以前一样在夜間零下三度、白天零上八度的天气在帳篷里躺着。去年四月，刮了一陣冰風，轉盤操縱手躲在雪堆中間，拖拉机羣冻住在草原上。請問穆拉維約夫場長同志，你能不能保證今年春天不会再發生这种至今还在談論的禍事？

這場关于拖拉机縱队比“屯营制”优越的談話进行了一个多鐘头。然后，場長裝出一臉若無其事的神气，又簽署了二十分鐘的公文。末了，他終於抬起眼睛，善良的帶着嘲諷意味的眼睛。

前几天，我給他听診：他有心臟病。我开了柯柯鹼和金盞花汁，一天服三次，每次一湯匙；每天睡眠不得少于八小时；严格地攝生等等。今天，我沒看到我的处方中有哪一样他遵守了！严格的攝生！难怪我在記事册里这几个字底下特別划上一道粗綫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

“啊，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这会有什么結果呢，呃？”

場長老是喔呀喔的。他吐字又柔和又从容。我覺得他挺可亲。为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因为他簡直不像一个国营谷物农場的場長，这所农場的可耕地不比有些西欧国家的全部可耕地少。

“結果是看誰战胜誰，就跟合作社和私人資本之間的斗争一样。”

“我看不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伊凡·伊凡諾維奇(这是場長的名字)用右手使勁地揉着左手。是疼痛呢，还是習慣呢？

“好吧，塔吉雅娜·彼得罗芙娜。我們倒像俗話說的那樣，算算帳看。您要我作的事，我不是都作了嗎？外科用具不是已經訂了嗎？”

“是的。”

“医疗用的血清不是已經按照你开的單子訂了，而且訂的数量大大超过需要了嗎？”

“是的。訂的数量是必需的。”

“妇嬰衛生的掛圖不是訂了嗎？結果惹得全农場的人笑話。”

“是的。他們笑話是因为孩子少。可是將來会多起来的。”

“上星期，您要我訂一件什么器械，后来我弄清楚了，沒有显微鏡，那家伙就不合用。这不是也訂了嗎？”

“是的。顯微鏡我們有，伊凡·伊凡諾維奇。您知不知道，打二月起，巨人農場就成立了外科、內科和牙科三個診療室呢？他們的藥房真了不起，藥物一應俱全。他們正在給病房單獨蓋一所房子。”

“那是巨人農場，塔吉雅娜·彼得羅芙娜。是的，可現在呢，您又來要求我，不，這哪是要求，簡直是堅持要我把瑪斯洛夫工程師的房間收回來，理由是您需要這房間來佈置病房，據我知道，誰也沒有要你佈置這麼個病房呀！”

“伊凡·伊凡諾維奇，瑪斯洛夫要是在哪一個區過一個夏天，決沒有什麼不方便。您就在干谷村給他一個房間吧，他反正不會從這中心村督察聯合收割機的工作。”

“塔吉雅娜·彼得羅芙娜，他從哪兒督察聯合收割機的工作最方便，這您管不着。我請您……”

“伊凡·伊凡諾維奇，您想想去年春天吧！我現在有十二個病號，其中四個是重病號。我對他們負着責任。請您這個聰明人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穆拉維約夫站起來，慢慢地走到窗口。我早就注意到他臉色轉白，可是在這一刻，他顯得特別蒼白。他打開窗子。為什麼？風一頭鑽進房間來，紙張從桌上飛到地上。他並不去撿它們。他茫然地微笑着，把兩張椅子併放在一起。我驚恐地望着他。他呢，喘着氣，又把第三張椅子放到那兩張的一頭。他用一隻手摸腦門子，像是竭力要想起什麼事情來，然後，輕輕地哼了一聲，坐到，不，躺在这排椅子上。

“伊凡·伊凡諾維奇，您怎麼啦？”

場長幾乎喘不過氣來。

“我的天，我闖了禍啦！我折磨了您！”

他好久不作声，我把一塊湿手巾敷在他心口，在他的写字桌里找到了我配的那瓶葯水，斥責他不該連瓶子都沒打開，又斥責我自己不該逼得他連病都發了；在這段有二十分鐘的時間里，他一直不作声。

“我多渾！您只要把我轟出去就得啦！”

蒼白色漸漸地消褪了。他想起來，我不讓他。

“好，好！塔吉雅娜·彼得羅芙娜，我認輸！我舉手投降。您會有您的病房！您會有！”

2. 一樁病情

我緩慢、緊張、費力地熟悉我的工作，這樣到了頭一年的末尾。關於我的工作，我只是約略地講了几个片斷的故事，從这里面，甚至看不出我在例如一些和醫療工作並不直接有關的事務上，化了多少時間。

區執行委員會要我們的醫療站在鄰近的集體農莊里組織托兒所。在當時，這是個嚴重的政治任務，於是我和護士卡秋莎費了不少勁，配搭從薩爾斯克區衛生處領來的“軟硬財產”。可是配搭財產只是工作的一半；我還得訓練從集體農莊來的兩個自願在托兒所工作的女共青團員。

從五月份起，醫療站里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助理醫師被辭退了，走了，這我很高興，因為他在我和病人之間製造糾紛，喝醉了酒，就大叫大鬧，說他不能讓一個年青丫頭對自己發號施令。其餘的人員都很好，但是護士們就像故意為難似的，一個個地結婚，上遠東去。說起來這自然是個巧合，但是兩個護士先後都到遠東去了。